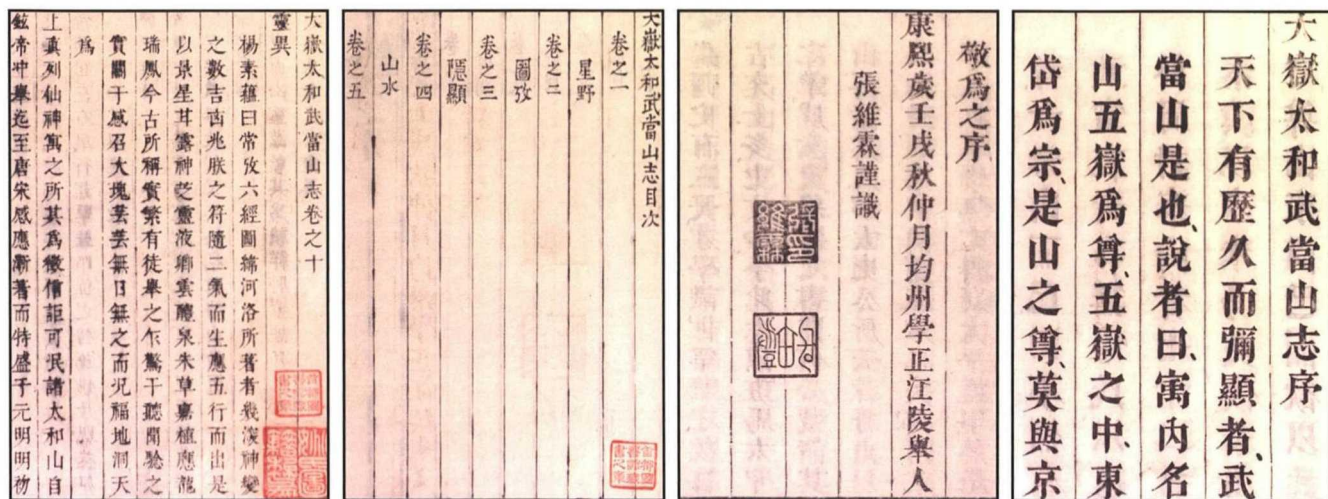


# 新见清康熙《大岳太和武当山志》述略

张全晓

DOI:10.19420/j.cnki.10069593.2019.01.013



由分守湖广下荆南道杨素蕴修、均州知州王民皞等纂的康熙《大岳太和武当山志》二十卷是清代成书较早的一部官修山志，也是武当道教史上的一部重要经典。可惜该志剞劂不久，所刻即“失于净乐之火”，故流传不广，至乾隆九年（1744）分守安襄郢下荆南道王概为新修山志而访辑旧本时，也“仅得山间所藏钞本”<sup>1</sup>。此后，该志既罕见流播，亦罕为官私书目所著录，论者多称其亡佚，每引以为憾。最近，武当文化爱好者在北京首都图书馆意外发现该志，不仅卷帙无缺，而且品相完好，洵属幸甚。为公诸同道，兹述其文献特征及主要内容如下：

## 著者与成书

主修康熙《大岳太和武当山志》者，是陕西宜君人杨素蕴，字筠涓，号退庵，顺治九年（1652）进士，

康熙十七年（1678）题补湖广下荆南道。据杨素蕴自述，他“性癖山水，历天下名山之半，考名山水记则几乎尽矣”<sup>2</sup>。至于武当山，他很早就从明人王世贞的游记中有所了解。康熙十七年杨素蕴奉命分守湖广下荆南道，他不仅多次乘便“虔礼帝阁”，还格外留意于武当山志的编纂。他一面慨叹“志之弗可已也”，同时又对前志“详略不之审，文之不章，未能出名山真面目”感到非常不满，遂决心重修一部“用传名山”的新志。很快，杨素蕴就物色到了两个合适的主纂，一个是均州知州王民皞，另一个是均州儒学训导卢维兹。王民皞，字孟迁，号熙园，江西临川人。卢维兹，字持庵，湖北黄安人。王民皞和卢维兹既同为杨素蕴的僚属，又同为武当山所在均州地方的长官，因此对重修山志都表现得相当积极。经过他们的“博访蒐求”和“广

罗汇集”，终至“累案盈笥”，如愿纂成《大岳太和武当山志》一书。

该志虽然是由杨素蕴主修，王民皞和卢维兹主纂，但实际参与者却远不止以上3人。据卢维兹序称，该志“付梓未竣”，杨素蕴即“荣擢山右学宪”，刊刻之事系由其继任者沈志礼“董厥成焉”。另据卷首“公阅姓氏”、“稽考官观岩洞碑记录稿姓名”、“膳清姓名”、“画图姓名”和“劖剔姓名”显示，该志与修者甚众，仅“公阅姓氏”一项就列举了上自襄阳府总镇张永祥，下至均学庠生王维祥等140余人，阵容不可谓不庞大，但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是深度参与了此番修志的相关事宜，则不得而知，因此这份冗长的名单似乎更像是一种荣誉和鼓励。也许正是有鉴于此，该志又在卷一“星野”的前面巧妙地给出了另外一份简明扼要的修志名单，其中“裁定”为郟襄藩参关西杨素蕴和古越沈志礼，“总校”为襄阳知府会稽范明宗，“纂辑”为均州知州临川王民皞，“参订”为均州儒学训导黄安卢维兹，“分阅”为均庠学生唐棣和朱琪。卷一的这份小名单，再加上卷首胪列的“稽考官观岩洞碑记录稿姓名”、“膳清姓名”、“画图姓名”和“劖剔姓名”，大致就是这次与修康熙《大岳太和武当山志》的核心组成人员。

关于该志的初纂时间，杨素蕴序称是在“庚申岁”其“自郟返游”以后，而卢维兹序则称早在“己未春”，其从杨素蕴入山“循例荐币”时，就已有修志之命。据此推断，该志很可能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就已经被提上日程并开始着手筹划，至康熙十九年（1680）则进入正式编纂阶段。又据卢维兹序称，该志系“匝岁成秩”，也就是用了满一年时间，恰在康熙二十年（1681）杨素蕴“荣擢山右学宪”之际纂成。杨素蕴离开武当山以后，对甫竟而未梓的志书仍念念不忘，为此他又专门自山右遗书继任者沈志礼，通过“以志序是嘱”的方式敦请沈志礼继续襄助该志的未尽事宜。在杨素蕴以及王民皞等人的轮番劝说下，沈志礼不仅慨然而为之作序，还主持完成了该志的后续刊行。具体

负责钤版任务的是来自江西湖口的刻工夏献、陈信高、沈士昭和吴昌圣等4人。据该志载录序跋的落款时间推断，夏献等人大约迟至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仲春才陆续完成了全部志书的刊刻工作。随后，这些新铸的志版便被存放于武当山净乐宫内，可惜还未及大规模刊布，即因康熙二十八年（1689）净乐宫回禄之灾而惨遭焚毁。

关于该志的志名，说法不一，卷首及卷尾载录序跋有称《大岳太和武当山志》者，亦有称《大岳太和山志》者，卷首目次既冠以《大岳太和武当山志》，而版心处又标注为《大岳太和山志》，这种同志而异名的现象，应该不单是技术层面上的志书规范问题，可能还与志书纂修者的认知和情感有关，他们一方面对明代武当山被敕封为“大岳太和山”的贵盛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易代之后的武当山能继续保有曾经的辉煌和荣耀，因此，他们不仅习惯性地沿袭了明代“大岳太和山”的政治徽号，同时又有意识地恢复了宋元时期颇为流行的“武当山”的旧称，以强调其“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的宗教属性，清初这种杂糅宋元明之长而形成的“大岳太和武当山”的说法，既是清人的新创，也反映了山志纂修者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态。

## 内容与特色

首都图书馆藏清康熙《大岳太和武当山志》，2函8册，半页10行，行20字，花口，单黑鱼尾，乌丝栏，四周单边，版心标注志名、卷次、卷目、页码等内容，字体端秀，劖剔精工，具有典型清初刻本的风格。

该志卷首依次载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秋八月望日巡抚湖广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西蜀潼川王新命序、康熙甲子（1684）仲春谷旦起居注日讲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华亭沈荃序、康熙辛酉（1681）立秋后一日赐进士中宪大夫湖广分守下荆南道关西杨素蕴序、康熙壬戌（1682）重九后二日湖广分守下荆南道参议古越沈志礼序、康

熙甲子(1684)仲春谷旦赐进士出身提督湖广通省学政按察使司金事乌程姚淳焘序、康熙壬戌菊月下浣湖广襄阳郡守范明宗序、康熙壬戌秋季之吉均州知州王民皞序和康熙壬戌仲秋均州学正江陵举人张维霖序;次列本志目次、公阅姓氏、稽考官观岩洞碑记录稿姓名、膳清姓名、画图姓名和劖劖姓名,另附纂修太和山旧志姓氏及均州庠生唐棣的简短识语;又次为题署“知州王民皞识”的修志凡例十八则。

正文凡二十卷,卷一星野,卷二图考,卷三隐显,卷四山水,卷五圣纪,卷六宫殿,卷七庵祠,卷八祀典,卷九仙真,卷十灵异,卷十一物产,卷十二古迹,卷十三莅礼,卷十四神谟,卷十五御制,卷十六至卷二十艺文,艺文下又依次析作赋、碑、赞、铭、疏文、祭文、记、歌、四言、五言古、七言古、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六言等类,总计16目,790篇,24万字。各目皆前缀杨素蕴所撰序言,末附王民皞所撰跋语以及卢维兹所撰参考,在卷首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本志设卷立目的动因和旨趣。

卷尾依次载有均州知州王民皞未署日期的总跋、康熙二十二年孟冬月立冬日均州儒学训导卢维兹的后序以及康熙癸亥(1683)季夏均州吏目钱塘杨淮昌的后序。

通览全书,康熙《大岳太和武当山志》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兼具山志和道经的双重属性。作为一部书成众手的官修山志,该志从修志人员的配备到志体的订立、卷目的设置乃至序跋的安排,都充分体现了官修志书的格局和法度。首先,修志人员既以郧襄藩参、襄阳知府、均州知州、均州儒学训导、均州庠生为主,形成了一个层级分明、职责明确的线性结构,同时又尽量覆盖到武当山所在地方的相关官员和社会贤达,以最大限度地争取他们对志书的关心和支持,这种组织调配人力资源的手段也是官修方志惯常的做法。其次,重视凡例,强调“志有定体,先其纲领,后其节目,不可易也”<sup>3</sup>,该志共有凡例十八则,首二则总括全志,

其余十六则分别对应正文自星野以迄艺文等十六目,一则一目,条分缕析,同样契合官修方志循规蹈矩的志体。再次,该志部分卷目的设置明显带有传统史志的色彩,如卷一“星野”,本旧志所无,系纂修者“采之州乘”而来;又如卷十一“物产”,旧志于此主要集中在记载与玄帝有关的一些灵植和神物,而该志则将其收录范围扩大到了谷、豆、麦、蔬、瓜、药、果、木、竹、花、草、毛、羽、麟、介等15个属类,这显然也是袭用了官修方志对地方物产通行的书写范式。此外,该志于卷首载序八篇,于卷尾又另载一跋二序,凡十序一跋,内容率多重复,此举虽有助于扩大志书的社会影响,却同样没有跳出官修方志滥序的窠臼。

该志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收录了很多有关武当道教的内容。首先,对本山供奉的主神玄天上帝,该志不仅多方崇礼,还在卷五“圣纪”、卷十“灵异”以及卷十四“神谟”中通过专卷专目的形式反复予以宣扬,其中“圣纪”载“金阙化身”至“天官家庆”等玄帝本生故事20条,“灵异”载“归天降日”至“水涌洪钟”等玄帝灵验故事10条,“神谟”又载太上丹经、玉皇诏封、玄帝真言以及《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诸文,这些故事和经文大都源出《道藏》,意在为玄帝信仰张目。其次,对入志历代仙真,纂修者强调:“有太上而后有众神,有众神而后有仙真,前志所未及也。至于修真混置仙真之列,则冒妄无差等矣,故分别纪之。”<sup>4</sup>缘此,该志卷九“仙真”的收录对象较前志一下子就扩大到了太上、众神、仙真、修真等4个层面,志书的道教色彩也因之被再度强化。此外,该志卷九“仙真”还附传明代武当高僧不二和尚,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山志纂修者开放包容的宗教心态,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又生怕因此冲淡了该志的道教色彩,于是便忙不迭地辩称“禅僧不二乃得附著,余僧虽夥,概弗录”<sup>5</sup>,接着又再次申明“夫武当之传羽仙正也,传禅衲偶也,偶则虽从别从,特亦附之云尔”<sup>6</sup>。

也许正是由于该志的部分卷目对道教内容过于偏

重，乾隆初年另行修志的王概才批评其“辞浮于事，且多引科策，颇近宋人清词，疑道士家或有假而窜入者，未敢尽信”<sup>7</sup>。王概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也恰可借此考见该志道教色彩之浓厚。至于王概又疑心该志“道士家或有假而窜入者”，则恐非实情，至少从目前所见修志人员的构成来看，该志并未吸纳武当道士的参与。在没有教门中人参与的情况下，该志仍能保有如此鲜明的道教特色，大抵与武当山玄帝祖庭的历史地位、康熙皇帝的崇祀活动以及主修杨素蕴、主纂王民皞等人对武当道教的情感态度有关。

## | 地位与价值

康熙《大岳太和武当山志》虽然不是清代第一部武当山志，但该志的纂修不仅延续了武当山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而且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武当山整个山志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非常特殊。

就承上而言，该志并非空无依傍，而是在前志的基础上重新纂辑而成，其所据旧志，一为“前明遗刻出自中使者”，一为“郟郡纂本出自李明经讳绍贤者”，尽管纂修者对这两部明清旧志都颇有微词，但还是做了很多必不可少的参考和借鉴，如卷六“宫殿”即因“旧本详悉”而“未有增删”，其他卷目亦常可窥见其渊源前志者。目前，清郟郡纂本已佚，明中使遗刻仅存嘉靖四十年（1561）吕祥增刻本，嘉靖三十五年（1556）王佐初刻本以及最有可能为该志所据的万历十一年（1583）田玉递刻本也都失传已久，幸赖该志承续，这些散佚前志才免遭湮没中辍之虞。

就启下而言，该志纂成以后，又成为乾隆初年王概新修《大岳太和山纪略》惟一一部可资利用的旧志，从类目设置到志书内容都对后者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王概山志凡八卷十目，十目中的星野、图考、山川、圣纪、宫殿、祀典、仙真、物产、艺文等九目即悉出该志，新设拾遗一目也不过是该志原设古迹、灵异二目的综合。不仅如此，该志很多卷目的具体内容也都被王概

山志直接袭用或重新编次入志。至于该志甚为纂修者得意的“大岳太和山全图”，王概山志同样仍其创制，并请署名黎朝盈者重新摹绘了一幅更为精美的长卷收入志中。民国十一年（1922），襄阳道尹熊宾新纂《续修大岳太和山志》，又几乎字句无遗地抄录了王概山志的全部内容，倘追根溯源，熊宾山志无疑也是对该志一种间接的肯定和传承。

由于清代第一部武当山志已佚，康熙《大岳太和武当山志》就成了武当山现存最早的一部清修山志，为研究晚明至清初武当山历史文化的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例如，该志不仅在序跋中多次论及康熙初年第一部清修武当山志的梗概，还附录其纂修姓氏一份。据此可知，清代第一部武当山志乃分守湖广下荆南道金朝用、郟阳知府刘作霖主修，郟县教谕万甲、郟县明经李绍贤和谢于宸主纂，是一部几乎完全由郟阳地方官员把持纂修的山志，因此又被指称为“郟郡纂本”。然而，吊诡的是，反观该志纂修人员的构成，虽然阵容庞大，涉及面广，但当时仍然履任郟阳知府的刘作霖却被排斥在外，志书的主纂也全部换成了均州方面的人士。细绎该志留下的这些线索，再结合康熙初年武当山行政管理体制曾在湖广下荆南道襄阳府和郟阳府间短暂摇摆的史实，便不难发现，时隔不远、同样纂修于康熙初年的这两部武当山志，除了理念、形式和内容上的变化，可能还事关地方行政权力的运作以及文化话语权的博弈等深层次问题。

再如，有关明末清初武当道教的情况，该志卷九“仙真”新增明末罗洪先、李长庚以及清初白玄福、杨常炫、蒋超等高道入传，另附募化重修太和山宫殿全真姓名一份；卷十三“莅礼”录明清武当山净乐宫、迎恩宫等八宫提点，亦各有续补；卷十五“艺文”载明神宗《真武本传经序》并卷十六“艺文”载杨常炫《合刻武当总真纪胜集序》，又记述了明神宗对武当

玄帝的崇祀以及明末清初武当道教文献的刊刻和流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志卷首沈志礼序及卷八“祀典”不仅反复述及康熙十二年(1673)清圣祖玄烨钦差御前侍卫吴当、卫色虎立奉旨斋银祭告武当玄帝故事,还刻意强调了敕命“兼绘山图”进览的细节,并宣称此番绘图进览的目的意在“约其寻仞,为鸣銮上祀、检玉探策之举”。据此可知,康熙初年清圣祖玄烨还曾一度有过南巡武当的计划,并且已经为此做过一些初步的准备,此事后来虽因“诸逆扰均”而“未果”,但借此已足可考见清初康熙皇帝对武当山和武当道教的尊崇。这些珍贵的道教史料,既有助于深入了解明末清初武当道教的发展脉络,亦有助于廓清以往对清初武当道教地位陡落的模糊认识。

又如,该志卷帙最繁的“艺文”一目,收录“历代名公巨卿以至修士名人”的武当诗文甚夥,其中仅明人游记,就依次载有王世贞、陈文烛、汪道昆、王在晋、冯时可、顾璘、王嗣美、徐学谟、姚履素、谭元春、杨鹤等10余人的20余篇,这些各出机杼的名家游记叙事严整,文辞畅达,既是明代游记文学的佳作,也是研究明代武当山历史文化及其宗教旅游活动的重要文献。此外,该志载录诗文的内容虽以题咏和记述武当山为主,但诗文作者的来源分布却非常广泛,

涉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文化内涵。易言之,这些入志诗文既可以通过史诗互证的方式为武当文化研究提供必要支撑,同时还可以跳出武当,在更为宽广的学术领域发挥辑佚、校勘等方面的独特功用。

当然,康熙《大岳太和武当山志》也并非尽善尽美之作。早在乾隆初年,王概就曾批评其“辞浮于事”“引经不切”,又责其“妄作为古”“纪传不应夹杂议论”<sup>8</sup>。除了这些体例和内容上有待商榷的地方,该志在事实表述方面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瑕疵。例如,卷十二“古迹”称“孟浩然石像碑在五龙宫浩然岩下”,卷二十“艺文”又载署名孟浩然的七言绝句《自题石像》一首,此二处貌似圆融,实则误将本属元代武当高道浩然子李明良的石像和题诗都附会到了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身上;再如,卷十五“艺文”载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朱棣“敕正一嗣教真人张守清”亦误,张守清乃元代武当高道,既不是正一嗣教真人,更不可能穿越时代接受明帝的敕命,故此处之“张守清”显系“张宇清”之误。类似这样的疏失,不仅零星散见于该志的部分卷目,还一直延续到了乾隆初年的《大岳太和山纪略》和民国初年的《续修大岳太和山志》,尤需引起阅读和使用者的注意。📖

[作者单位为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代武当山志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4BZJ033)的阶段成果。]

## 注:

- 1、7. 王概修,姚士馆等纂:《大岳太和山纪略》,卷首王概序,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
2. 杨素蕴修,王氏隸等纂:《大岳太和武当山志》,卷首杨素蕴序,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 3、4、5. 杨素蕴修,王氏隸等纂:《大岳太和武当山志》,卷首凡例,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6. 杨素蕴修,王氏隸等纂:《大岳太和武当山志》,卷九“仙真”,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8. 王概修,姚士馆等纂:《大岳太和山纪略》,卷首凡例,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